

## 呼伦贝尔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调查研究<sup>\*</sup>

刘晓春 乌日乌特

呼伦贝尔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对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目前,呼伦贝尔市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体系,数据库建设也日臻完善。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和多样性的特点。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呼伦贝尔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成效显著,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从法制建设、政策扶持,人才培育、传承人保障、非遗进校园和生产性转化等方面进行积极的调整。

关键词:呼伦贝尔 非物质文化遗产 新古典“结构—功能论” 保护和传承

作者刘晓春,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6号楼,邮编100081。乌日乌特,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地址:北京市,邮编100875。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年中国成为缔约国。此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成了中国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连结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绩。<sup>①</sup>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两次提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各级文化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推动非遗保护和传承,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非遗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呼伦贝尔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族志研究及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7ZDA11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与创新性转化研究”(项目编号:19AMZ015)、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基地专项课题”(项目编号:2020ZJD004)、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sup>①</sup> 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 2021年8月12日。

市,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秉持“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积极探索非遗保护的特点、规律,从政策扶持到资金投入,全方位地不断推动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

## 一、相关成果与研究框架

2021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10周年。10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水平有了持续提升。“十三五”期间,新增地方性保护条例37部,非遗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日趋健全;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认定非遗代表性项目10万余项,认定各级代表性传承人9万多人。我国共有4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sup>①</sup>整个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尊重、保护和传承意识有了质的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载体。

从研究现状来看,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已近20年,但从整体来看仍然处在发展完善的阶段。2005年伊始,国内学界在非遗概念、内涵、机理、结构、途径等方面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研究内容从项目挖掘考证、文化内涵、理论方法、社会功能、文化变迁、发展展望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为相关课题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撑。但是,对多民族共有项目之间的关系,跨文化的比较、论证,“多元一体”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成果较少。如何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影响,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增进“五个认同”、为国家战略服务等方面的研究尚有不足。

目前,关于呼伦贝尔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非遗保护与传承问题研究,关注焦点主要是呼伦贝尔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现状、<sup>②</sup>问题与困境、<sup>③</sup>传承的路径、<sup>④</sup>如何保护、<sup>⑤</sup>文化产业开发、<sup>⑥</sup>民族认同<sup>⑦</sup>等。在呼伦贝尔地区非遗研究中,达斡尔族、<sup>⑧</sup>鄂伦春族、<sup>⑨</sup>鄂温克族、<sup>⑩</sup>蒙古族<sup>⑪</sup>等专题研究成果比较深入,个案研究具有典型性。二是实证研究,关注的领域主要是非遗进校园和非遗体验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进

① 参见郑海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令人瞩目》,《人民日报》2021年6月12日。

② 参见杜辉、周庆柱、袁野:《呼伦贝尔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年第1期。

③ 参见刘忠国:《“三少”民族“非遗”保护传承中的问题与困境研究》,《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④ 参见王学勤、龚宇:《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新路径——传承人口述史》,《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⑤ 参见毅松:《应高度重视“三少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中国民族》2014年第9期。

⑥ 参见启戈:《内蒙古人口较少民族的非遗保护与文化产业开发》,《北方经济》2013年第17期。

⑦ 参见王丙珍:《北方“三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认同浅论》,《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⑧ 参见王秀枝:《达斡尔族传统音乐在“斡包节”中的传承与发展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张良祥等:《达斡尔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发展研究》,《辽宁体育科技》2015年第6期。

⑨ 参见刘晓春、关小云:《鄂伦春非遗项目及传承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2018年第4期;倪卓:《鄂伦春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11期。

⑩ 参见汤洋:《论鄂温克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龚宇:《鄂温克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调查》,《满语研究》2012年第1期;徐兴锐:《呼伦贝尔鄂温克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变迁研究》,《边疆经济与文化》2018年第4期。

⑪ 参见敖登高娃:《论巴尔虎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内蒙古艺术》2016年第1期。

校园作为我国重要的文化战略,一直以来受到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呼伦贝尔地区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王学勤以呼伦贝尔学院为研究个案,认为地方高校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方面有着地缘、文化、人才等诸多优势,应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在课堂教学,科学研究和大学生校园活动等诸多层面建构起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体系。这对于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高素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提高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等都有积极作用和良好效应。<sup>①</sup> 三是法律法规方面的研究。研究议题围绕呼伦贝尔市非遗地方立法、<sup>②</sup>立法建议<sup>③</sup>和法律保护<sup>④</sup>等几个方面。四是非遗与文旅融合发展研究。基于开发主客体的现实需求,蒋玉华对呼伦贝尔非遗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通过引入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机制、准确进行市场定位和科学规划、深度挖掘非遗民俗文化内涵、设计合理的旅游线路等开发思路,以期促进呼伦贝尔非遗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可持续发展。<sup>⑤</sup> 呼伦贝尔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旅游纪念品开发、<sup>⑥</sup>内蒙古“三少民族”地区创艺小镇创建路径研究<sup>⑦</sup>等也是学者关注的话题。五是非遗与档案建设方面的研究。伊敏认为,图书馆具有保存文化遗产的职能,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职能部门之一,也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申报、保护工作提供服务的部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采集、保存、数据库建设、宣传、展示与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sup>⑧</sup> 从文化遗产传承视角探讨民俗档案保护<sup>⑨</sup>和数字化共享平台研究<sup>⑩</sup>等成果也逐渐增多。

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呼伦贝尔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理论建设、项目挖掘、传承方式、非遗活化、非遗政策等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性传承、文化适应、文化冲突、文化融合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如何提炼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思想,打造有灵魂的文化产品应用到实践中尚有不足;如何提取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符号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服务仍需加强。

呼伦贝尔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研究的资料及动态发展对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思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有关实体经营行为的研究也为本文提供了研究角度。古典的结构一功能论对文化遗产的利用和保护持一种静态的观点,认为文化遗产就是

① 参见王学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体系在地方高校的构建与实践——以呼伦贝尔学院“三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为例》,《民族教育研究》2015年第6期。

② 参见百秋、陈昊、刘悦、郑强、丁鹏:《呼伦贝尔市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立法保护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③ 参见崔航:《呼伦贝尔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和对策》,《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④ 参见秦萌:《三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研究》,《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⑤ 参见蒋玉华:《非遗视界下呼伦贝尔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2017年第3期。

⑥ 参见罗莹:《呼伦贝尔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旅游纪念品开发——产品设计教学中,转变设计观念结合当地文化对民族产品进行设计开发》,《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⑦ 参见吕珊珊:《内蒙古“三少民族”地区创艺小镇创建路径研究》,《大众文艺》2018年第4期。

⑧ 参见伊敏:《民族地区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定位与思考——兼谈呼伦贝尔市图书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内蒙古图书馆工作》2009年第3期。

⑨ 参见司宏伟、刘增强:《基于文化遗产传承视阈的内蒙古“三少民族”民俗档案保护研究》,《黑龙江档案》2018年第2期。

⑩ 参见穆林、包玉玲:《留存乌兰牧骑艺术档案 传承“三少民族”传统文化——以“内蒙古‘三少民族’档案资源建设及数字化共享平台研究”项目为例》,《区域治理》2019年第38期。

静态的文物或藏品。<sup>①</sup>新古典“结构—功能论”采用动态的视角,认为文化遗产是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资产,其价值可以被利用和开发。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到李培林的“社会结构转型”理论,标志着我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范式从古典“结构—功能论”发展成为新古典研究范式。<sup>②</sup>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范式从对文化遗产的利用角度探讨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方面,应该突破传统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固化思维。可以采用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视角,将文化遗产置于动态的研究场域中,分析文化遗产与周围社区的互动以及文化遗产的功能性变化。<sup>③</sup>

关于人与物的关系研究,有学者认为,不同的物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宇宙观对人们如何认知和看待物具有重要影响。关于非遗传承人与当代生活的融合问题,近半个世纪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让我们逐渐认识到文化遗产中“物”与“人”的本质差异:前者呈现历史,又被时间销蚀,具体的“物”嵌入文化遗产时因其唯一性而价值显著;后者传播历史,依赖时间繁衍,具体的“人”创造文化遗产时因其卓越性而影响深远。前者由后者嵌入文化遗产,后者因前者实践其智慧与创造力。也就是说,“物”的唯一性与历史性,成就了物质文化遗产的功用与知识;“人”的创造性与传承性,成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感与智慧。当然,“物”与“人”是文化遗产的“两面”,“物”因“人”而精妙绝伦,“人”因“物”而闻名遐迩。“人”与“物”相得益彰,文化遗产作为一宗优秀的历史作品得以面世传承。在这个意义上说,国家非遗传承人保护制度既是时代使然,也是文化遗产的内在要求。从整体上看,发达地区的转型更快、更全面、更深入,落后地区的转型相对较慢、程度较低。从传承人的例子来说,部分传承人积极参与当代市场生活,塑造自己全新的当代人身份,重新激活文化遗产的现实功能,“人”的创造性唤醒了“物”的当代价值。<sup>④</sup>

呼伦贝尔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具有可行性。一是经济全球化为非遗传承提供了更多受众,其传承方式和途径也在不断更新。二是教育发展为民族文化传播提供了更多渠道。三是旅游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为民族文化传播提供新的方式,非遗技艺可以通过互联网、视频等方式进行传播和记载。

## 二、呼伦贝尔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总体情况与特点

非遗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截至2020年10月底,呼伦贝尔已建立市级非遗保护中心1处,各旗市区设立非遗保护机构13处,建设非遗博物馆5座,设立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36家,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俄罗斯族和蒙古族非遗展厅已建成并对外开放。目前,呼伦贝尔市从事非遗保护工作人员共计45名。其中,中级以上职称25人,占比56%(副

<sup>①</sup> 参见包秀慧:《人类学视野中的历史人文资源开发与经营——以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化创意产品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

<sup>②</sup> 参见张继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从“差序格局”到“社会结构转型”》,《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sup>③</sup> 参见张继焦:《换一个角度看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第3期。

<sup>④</sup> 参见孙正国:《非遗传承人与当代生活》,《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6月3日。

高以上职称13人,占比29%);少数民族工作者23名,占比51%。<sup>①</sup>

### (一)呼伦贝尔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总体情况

近年来,呼伦贝尔地区各部门积极行动,参与到推进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中来,不断加大财政方面的投入力度,为非遗保护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为了完善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的建设,2019年,呼伦贝尔市本级投入非遗保护业务经费438万元,其中,用于自治区传统工艺振兴及品牌建设的新巴尔虎左旗蒙古族毡绣项目投资10万元;开设两期总计100人的自治区非遗传承人研培计划项目10万元;向132个自治区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发放传习补助经费66万元。<sup>②</sup>2020年上半年,市财政局投入非遗保护业务经费739.2万元,其中722万元用于呼伦贝尔地区文联的民歌项目,进一步加大了对呼伦贝尔地区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保护与传承力度。

呼伦贝尔非遗中心积极开展非遗资源普查,有序推进非遗数据库建设。开展普查、收集整理资料是非遗立档保护的重要环节,目前,市非遗保护中心现已整理储存非遗资料800余卷,征集非遗实物1200件(套),储存非遗1080P以上清晰度视频资料40多T,相关照片资料3万余张,为更直观、更完整地保护和传承非遗资源奠定了良好基础。为进一步挖掘、整理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2019年,呼伦贝尔市向内蒙古自治区申请落实非遗保护专项资金126万元,其中用于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和俄罗斯族四个人口较少民族非遗资源补充调查资金为40万元。呼伦贝尔市先后组织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开展非遗资源普查和补充调查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调查过程中,各调查组深入各个乡镇(苏木),在走访村民、居民(含传承人)的基础上,调查项目152项,搜集整理非遗线索1000余条,填写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表3个(共计39份),绘制非遗普查线路图、项目分布图8幅,形成普查文字资料33万字,搜集整理原始材料汇编4册,发布非遗资源补充调查相关文件及信息15篇。所有调查形成的文字材料全部录入电脑,并实行专人管理。呼伦贝尔市共刻录光碟600余张,内容包括录音资料151小时,照片3.4万余幅,视频351小时,目前已建立起较为详尽的数据档案。<sup>③</sup>

### (二)呼伦贝尔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文化功能派理论认为,任何文化都有特定的功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也有其特定的功能和场域。呼伦贝尔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也是如此。

一是地域性。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呼伦贝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地各族人民千百年来繁衍生息、不断发展的智慧结晶。呼伦贝尔位于中俄蒙三国交界的中心地带,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这里和谐发展,俄罗斯文化与中国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地理上,呼伦贝尔自然生态多元,东南部为大兴安岭浅山区与松嫩平原交汇处,地势逐渐由丘陵进入平原,气候温和湿润,这里是东北传统的渔猎文化圈,也是稻作文化区,该地区的达斡尔族从事农业生产,鄂温克族早期以狩猎为主要生计方式,2000年以后禁猎转产后从事半农半牧业。1945年前后,朝鲜族移民搬迁到嫩江流域的各个支流,将朝鲜半岛的稻作文化引入呼伦贝尔地区。大兴安岭北麓地区,则是传统的驯鹿狩猎文化带,最北部的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人依然坚持驯鹿饲养,而

<sup>①</sup> 参见呼伦贝尔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2015—2019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概况》,2019年。

<sup>②</sup> 参见呼伦贝尔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2020上半年统计数据》,2020年。

<sup>③</sup> 参见呼伦贝尔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呼伦贝尔市文化旅游广电局2019年工作报告》,2019年。

鄂伦春自治旗的鄂伦春族保持千年的狩猎活动虽然已经停止,转产农牧业,但鄂伦春特色的狩猎技艺并没有消失殆尽。翻过大兴安岭一路向西,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地理学上称为呼伦贝尔高原,每年西伯利亚的寒流首先到达呼伦贝尔草原,草甸型草原使得这里的蒙古族、鄂温克族始终保持着游牧生活,随处可见的蒙古包和畜牧场景,可以说这里是中国游牧文化的核心地带和净土。通常,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一定区域内产生的具有相同生计方式和审美观念的文化结晶,而且受非遗产生和流传地区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以及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地域特点,而非遗文化载体,即人类生产的环境对民族文化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持有环境决定论的学者们坚持认为环境是决定文化形态的重要因素。

二是民族性。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多民族不断交流交往交融而形成的。中华文明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历史悠久,成就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国家。呼伦贝尔生活着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蒙古族、俄罗斯族、汉族、朝鲜族、满族和回族等 42 个民族,其中全国仅有的三个少数民族自治旗在呼伦贝尔。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俄罗斯族及朝鲜族的非遗项目占据呼伦贝尔非遗的 99% 以上。从民族文化角度来看,各民族的文化符号非常明显,例如,从民族服装样式和图案就可以甄别出民族和部落身份。从森林到草原,呼伦贝尔多民族孕育了极具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并表现出显著的识别性和符号性。如鄂伦春的篝火节、鄂温克的瑟宾节、蒙古族的那达慕、俄罗斯族的巴斯克节都非常具有民族性,蒙古族医药、鄂温克族的抢苏、达斡尔族的曲棍球更是其民族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发展传承呼伦贝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要尊重其民族性,深入挖掘非遗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在发展非遗产业的同时,更要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增强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呼伦贝尔地区非遗项目各民族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 呼伦贝尔地区各民族非遗项目分布情况

单位:项

民族	国家级	自治区级	地市级
蒙古族	2	41	99
达斡尔族	5	22	35
鄂温克族	6	31	55
鄂伦春族	3	8	14
俄罗斯族	1	5	8
朝鲜族		2	3
汉族		1	12

数据来源:根据笔者调研所得数据整理。

三是多样性。因地理区域相对封闭,有些非遗项目在呼伦贝尔地区是独有的,如驯鹿文化,全国只有呼伦贝尔大兴安岭北麓地区存在,陈巴尔虎柳条蒙古包只存在于呼伦贝尔牧区。诸如此类的非遗项目,保留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独特性一目了然。多民族聚居造就了呼伦贝尔多元的民族文化,而多元的民族文化更是体现在非物质外文化项目的类别方面。呼伦贝尔非物质文化遗产总共 400 多项,囊括了民间文学、民族传统体育、民族音乐舞蹈、传统手工艺、民族医学,曲艺、民俗等七个大方面,类别广、项目多样是呼伦贝尔非遗的最显著的特点,

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现(见表2)。因此,在研究呼伦贝尔非遗的时候,应该整体地去认识把握,才能真正地了解呼伦贝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体情况。

表2 呼伦贝尔地区非遗项目分类 单位:项

项目类别	国家级数量	自治区级数量	呼伦贝尔地区级数量
民间文学类		8	10
音乐与舞蹈类	7	18	46
传统体育、游戏竞技类	2	14	23
传统手工技艺和美术类	5	57	109
传统医药类		3	17
民俗类	1	17	45
曲艺类			5

数据来源:根据笔者调研所得数据整理。

### 三、呼伦贝尔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功能的衍生

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认为,“在经济社会转型条件下,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可以表现出新的功能,而且可以形成新的结构”。<sup>①</sup>在以往文化传播过程中,非遗产品主要服务于展示和旅游的需要,但随着文创产品的开发,非遗中的一切元素作为一种文化的整体,可以被寄托于某种物件当中,无论是产品的外观,还是蕴含的文化内核,都可以作为当代非遗的文化表达,传统文化也由此发生了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的转换,使非遗实现了从文化资源到文化资本的转变,变为内源性文化生产要素。文化产品从以往的普通旅游纪念品的纪念性功能衍生出更多的功能,呼伦贝尔地方文化能够通过产品的被使用,渗透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进而带动了其他文博机构和人文资源传统文化的转型。

一是促进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发展。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为适应非遗活态流变性和整体性特征而采取的一种区域性整体保护模式。2006年以来,呼伦贝尔市积极组织专家学者、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与有关部门合作,多次到旗市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实地走访调研,在民族文化保护最完整、最具代表性的地区,划定保护范围,制定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目前,呼伦贝尔已成功申报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区4个,且全部为“三少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分别是: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使鹿文化生态保护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达斡尔族文化生态保护区、鄂伦春自治旗鄂伦春族文化生态保护区、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在建设过程中,各保护区根据实际情况积极探索,总结经验规律,非遗工作取得一定进展。通过因地制宜出台当地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不断完善非遗名录与项目保护体系,稳步实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加强抢救性记录工程和非遗数据库建设,积极组织传承人参加各类展示展演活动,推进“非遗+旅游”等举措,提升文化生态保护区知名度、美誉度。

<sup>①</sup> 李宇军、张继焦:《历史文化遗产与特色小镇的内源型发展——以新古典“结构—功能论”为分析框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二是启动并开展了四级非遗保护体系。呼伦贝尔市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四级非遗保护体系。呼伦贝尔的国家级、自治区级非遗名录建设,无论是非遗保护项目数量,还是传承人群数量,在全自治区都占有较大比重。<sup>①</sup>目前,已成功申报巴尔虎长调、鄂伦春赞达仁、鄂温克服饰、达斡尔乌钦等 17 项国家级非遗名录,在全自治区占比约 20%;巴尔虎服饰、甘珠尔庙会、达斡尔族刺绣等 120 项自治区级非遗名录,在全自治区占比约 24.6%。传承人数量位居全自治区之首,其中国家级传承人 10 人,自治区级传承人 146 人,地市级传承人 465 人,旗县级传承人 785 人。为完善四级保护体系建设,呼伦贝尔市每两年组织市、各旗市区进行项目推荐,经市直各部门、专家学者组成的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政府网站公示等流程,申报非遗项目。目前,公布呼伦贝尔地区级非遗项目 230 项,旗市区级非遗名录 457 项。每年组织非遗传承人及从业者参加各级培训班,提高传承人技艺水平。认真实施非遗传承人履职情况评估工作,通过与非遗传承人签订目标责任书,综合考察传、帮、带工作实绩等方式,加强对自治区级以上非遗传承人的管理工作。

三是推动非遗进校园。呼伦贝尔部分旗市区已将非遗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组织青少年参观非遗博物馆、传习基地,面向学生开办乌春、扎恩达勒、哈尼卡等手工艺课,从源头培养青少年非遗保护兴趣和意识。

四是通过非遗项目增加就业和经济收入。为了进一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传承民族文化和增产增收的需求,呼伦贝尔市各级政府持续推进“非遗+旅游”“非遗+传统工艺振兴”“非遗+扶贫”工作。通过邀请非遗专家、传承人、从业者举办蒙古族毡绣、巴尔虎服饰、索海固图勒、桦树皮制作等非遗保护项目专项培训,引导非遗从业者和致富带头人提高技艺水平和创新能力,促进增收就业。相关非遗产品企业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发展振兴传统工艺,招聘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使非遗衍生品研发制作能够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其中,陈巴尔虎旗文化馆设立在金骄蒙元文化传承发展有限公司内的非遗实景展示基地,安置就业岗位 80 多个;太阳姑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通过鄂温克旗传统工艺类非遗保护项目——“鄂温克希温·乌娜吉”,用提供原材料、传授技艺方式,带动 11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每户贫困户全年增收 4000—8000 元不等。

五是促进非遗与旅游融合。积极开发、打造民俗节庆品牌,以加大文创产品宣传推荐为抓手,促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每年各旗市区政府通过举办“鄂伦春篝火节”“鄂温克瑟宾节”“伊慕讷节”等大型民俗节庆活动,吸引游客关注并主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在景区内设立非遗展示园,传承人现场展示非遗技艺;设立非遗游客体验区,销售非遗衍生产品;将非遗宣传展示融入自治区内外重要文旅推荐活动中,成立迎亲草原民俗文化产业园、鄂伦春乌力楞文化生态园、达斡尔民族园景区非遗文化展示园等园区。通过民族手工艺品制作及展销、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民族演艺事业发展不断探索非遗体验式旅游新路径。

六是体现了人与物互动的人类学意义。一是对于审美需求的满足。呼伦贝尔地区非遗文创产品设计者的设计初衷是通过对文化符号的借用,制作出具象化的产品来表达非遗之美。因此,大部分产品都具有赏心悦目的外观,也是消费者购买文创产品的动因之一。二是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呼伦贝尔非遗文创产品种类繁多,其中具有祝福和蕴含吉祥如意的产品是其主要特点。以物件来寄托情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寓情于物情怀的表现。三是产品的人际交

<sup>①</sup> 参见杜辉、周庆柱、袁野:《呼伦贝尔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 年第 1 期。



往功能在社会化的主体间互动中得到实现。有些文创产品的最初功能指向并不涵盖社会交往功能,由于消费者在主客体互动过程中推动了文创产品功能的改变,使产品的功能场域扩展至更大的范围。

#### 四、呼伦贝尔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发展的典型 案例:太阳姑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从内生文化角度来讲,民族地区蕴含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社会各界都在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与转化,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传统—现代转型的新模式。

“太阳花”,鄂温克语又称希温伊勒嘎,是根据鄂温克族神话故事太阳姑娘演绎出来的鄂温克族配饰,配饰原型以动物的皮毛为主,镶嵌一些美丽珠宝等。2015年12月31日,由鄂温克族自治旗太阳姑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申报的鄂温克族希温·乌娜吉(太阳姑娘)制作技艺被批准为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太阳姑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太阳花工作室”,成立于2010年,经过10年的发展现已成为呼伦贝尔,乃至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明星单位、特色产业精准扶贫户示范户。公司创始人乌仁也入选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016年,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文化产业创业园建成,乌仁将公司迁至园区,员工也由最初的1人发展到14人。

##### (一)“太阳花”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发展模式

1. 深入挖掘太阳花本身的文化底蕴及文化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千百年来通过不断劳动创造出来的精神结晶,蕴含着人类祖先的智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代际情感。鄂温克族是古老的森林民族,鄂温克人在狩猎、游牧生产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创造出了各种绘画、刺绣、雕刻、剪贴等艺术门类。创作灵感大都来自大自然中的各种花草树木、游鱼鸟兽、天上的日月星辰及云朵。例如,“太阳花系列配饰手工艺品”来自鄂温克族先民对于太阳的崇拜。该产品除了其本身的设计价值和材质成本外,背后所蕴含的人文寓意也是无形的价值,太阳花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的手里被赋予了灵魂,被赋予了生命,而这种生命不单单是艺术生命,还包括具有的经济价值。

2. 走出去的宣传战略与产品创新理念并行。2010年开始,太阳姑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每年参加各地举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销会近40场次,早期的参展因为产品单一,且做工粗糙,销售很差。2015年后,公司利用客户需求分析的方法,研发客户分析系统,开始不断地开发太阳花的衍生品,并在材质和技术上取得突破,相继开发了胸针、耳环、冰箱贴、手机支架、鼠标垫、车挂等产品。2015年至2020年期间,太阳姑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展销收益100多万元,其中2019年收入35万余元。公司在不断探索着“太阳花”传统与创新的各种可能的同时,利用互联网平台做线上线下推广,拓宽了营销渠道。新冠疫情暴发后,公司的线上销售优势显著,仅2020年5月份制作的手工艺品销售额就达到了3万元,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每年几十次的国内外展销会,让更多人看到鄂温克族的手工艺品,不仅传承了民族的传统文化,传递了优秀民族精神,还不断带动着牧民脱贫致富,因此说走出去战略、客户需求分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实现市场化、现代化的必要手段。

3. 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是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家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部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精神,大力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作为固本工程和铸魂工程来抓。2008年,原文化部、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联合印发的《关于在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活动的通知》,对推动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开展具有当地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活动提出要求,要指导各地各校充分利用校外活动场所和公共文化设施,组织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授课、示范性教学展演展示等活动,引导未成年人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魅力,自觉接受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导各地中小学组织举办“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系列活动,充分结合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学习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产品。自2018年开始,太阳姑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开始接待第一批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研学团队,2019年公司成为呼伦贝尔市中小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学传承基地。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衍生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学”模式,探索出文化传播与旅游产品融合发展的新途径。仅2019年基地就接待研学团队70个,共计1500人,研学一项获利10万元;2020年接待3600名中小學生;按照签订的协议,2021年基地将接待25,000名中小學生(每人每堂课收费37元)。<sup>①</sup>这样的营销模式不仅助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而且很好地化解了新冠疫情所带来的营销困境。

4. 多方位整合求发展。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大多年纪较大,思维相对于年轻人比较保守,对于市场的了解不足。呼伦贝尔也是如此,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都处在赔钱或收支持平的状态。但太阳姑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整合各种资源,利用多种渠道,主动对外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与时俱进,利用新媒体来拓展销路,实现了持续创收。首先,公司在早期,依靠政府的扶持解决了部分销售问题。其次,在公司起步阶段,获得了NGO机构平安普惠3万元无息贷款,这种融资方式对微小企业,尤其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帮助极大。再次,公司在发展时期,经常邀请媒体、专家、学者参观指导,不仅达到了自身宣传的目的,而且为产品的文化研发注入了活力。

5. 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共同体。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企业需要遵从市场规律,针对市场需求不断地创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太阳姑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10年的打磨中逐渐确立了太阳花的品牌影响力。与此同时,不断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合作,创造出太阳花品牌旗下的衍生品。例如,呼伦贝尔的毡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由于做工及设计落后,传承人思想守旧,导致迟迟无法打开市场。太阳花与毡艺传承人全面合作,打造产业共同体,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创新制作了毡质的电脑内胆和屏保电脑保护套,并在政府的扶持下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扶贫车间。以2019年为例,太阳花扶助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12名,每人每户增收近3000元。目前,已经有700多人参与过太阳花团队的订单,其中有264人是贫困户。温暖公益获得了回报,政府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文化产业方面给予50万元的奖励,使得太阳花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同时,公司助力精准扶贫的行为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 (二)“太阳花”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发展模式的启示

第一,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模式,保护

<sup>①</sup> 参见《2020年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文化产业创业园工作报告》,2020年12月24日。

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根本的是保护传承实践,保护传承能力,保护传承环境。无论是政府,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者,都需要解放思想,坚持走出去战略。

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应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尽量保持传统文化元素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去发展创新,加大产品创新方面的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产业化要时刻针对市场需求,去调整产品布局和营销策略。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去传播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多种经营和参与多方合作是太阳姑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功的秘诀。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化自信,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势必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第三,适应市场需求,整合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群体或个人是保护、传承、弘扬、振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力量,市场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行业创新发展的孵化器。要想做大做强,就要打破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有的产品局限,整合各种文化资源,创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相关的衍生品,遵从市场的需求,突破自我,跨区域跨行业合作。

第四,持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创业园区建设。国家文旅部提出“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鲜明、民众受益”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行业的建设目标。政府部门作为责任主体应积极组织传承人参加各类展示展演活动;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名度、美誉度。各地方、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创业建设中应实现旅游功能、产业功能与城市功能的有机联动。

第五,加强民族文化教育和研究有机结合,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校园中重生,在青少年中得到活态传承,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于社会的实际意义。

太阳姑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实践,是优秀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相融合、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典型案例。

## 五、呼伦贝尔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 (一)呼伦贝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主要问题

1. 缺乏专业的非遗保护机构和专业管理人才。第一,呼伦贝尔市及下辖的各级非遗保护中心都挂靠在文化馆,专职工作人员极少,大都身兼数职。随着国家对非遗保护工作重视程度的加强,各级文化馆本就有限的工作人员身兼公共文化和非遗保护双重职责,工作强度过大。非遗项目管理人才不足,据调查,呼伦贝尔市文旅广电局非遗科2019年刚刚从原社会文化科分离出来,科室只有2人;呼伦贝尔市非遗保护中心负责非遗工作的专职人员正式职工只有1名,聘用人员3名,忙于日常工作尚人手不足,很难深入系统开展工作。基层非遗管理人才缺乏的情况更为严重。虽然文化主管部门一直积极组织专业骨干参加自治区级和呼伦贝尔市级培训,但依然无法满足“非遗”保护工作需求。第二,呼伦贝尔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如果不懂得当地的民族文化很难开展工作。非遗工作人员大多不懂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客观上使得非遗工作开展得不充分,如非遗相关材料缺乏蒙古文版本。特别是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俄罗斯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型人才缺乏,这也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的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三,缺乏理论知识和高超技艺兼具的新时代传承人和传统工艺大师;缺少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专家学者,以及既懂非遗保护工作发展规律,又懂市场运作规律的生

产性保护和发展的经营管理人才。

2. 地方性非遗相关法规政策不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缺少统一的指导规则,许多已经制定单行条例的地区,条例中的规定也是照搬其他地区的法律法规,缺少论证和实地调研,没有真正适合自己地区的发展。从制度来看,关于民族地区的濒危性质的非遗项目和非遗传承人的传承体系,政府层面缺乏系统合理的规范,非遗传承人认定细则缺乏,特别是对传承人的保护细则缺失。

3.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后继乏人。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他们以超人的才智、灵性,贮存着、掌握着、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类别的文化传统和精湛的技艺,他们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接力赛”中的“执棒者”。就呼伦贝尔来说,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灭绝。许多民间艺术属独门绝技,口传心授,往往因人而存,人绝艺亡。因此,保护传承人和提高人的观念,要比保护简单的物质更复杂。而当今传承的基本方式也只有父传子,母传女的形式,传承范围较窄。传承人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见表3),而受信息化和城市化的冲击和经济收入的影响,年轻人对学习本民族语言、生活习俗、传统技艺等兴趣不足。<sup>①</sup> 呼伦贝尔地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平均年龄在65岁以上,且都是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牧区和林区,汉语水平较差,对于新兴事物的接受能力较低,思想保守。对于代际传承的想法也不尽相同,因此传承人思想需要去解放,需要与时俱进,从目前情况看,中青年的传承人对于非遗文旅结合方面做得明显好于老年传承人。

表3 呼伦贝尔地区非遗传承人年龄结构

级别	最大年龄(岁)	最小年龄(岁)
国家级	80	38
自治区级	82	42
呼伦贝尔地区级	71	33

数据来源:根据笔者调研所得数据整理。

4. 非遗申报属地原则问题突出。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传承人认定的特殊性,以及由于非遗工作者普遍存在业务不专,对于传统文化及认定对象的不了解等诸多因素,导致呼伦贝尔各级非遗认定存在着一些问题。早期认定程序缺乏明确的指导,工作方针不清晰,出现很多认证问题。其次,属地管辖问题弊端突出,尤其是在非遗传承人认定领域的问题多、意见多。例如,呼伦贝尔三个牧业旗以蒙古族为主,三个自治旗以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族为主,额尔古纳市以俄罗斯族为主,由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民族特色等因素,一些地区在申报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的时候,往往只申请享受当地自治权利的主体民族传承人和项目,而忽视了其他民族传承人,为此,很多少数民族传承人要到享受本民族自治的旗县去申报。但按照属地原则又是不允许的,因此,很多具有传承人资格的人和项目不能获得相应的资格认定。

5. 非遗保护工作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呼伦贝尔市各级政府均未设立非遗保护中心的专项经费预算,非遗保护中心开展活动所用经费均为文化馆免费开放资金,导致各级政府本就紧张的公共文化资金更为紧张。呼伦贝尔市在2018年、2019年、2020年分别拨付“文化创作和保护经费(含非遗保护)”20万元、18万元、17.2万元,拨付额度逐年递减,这些经费远远不能满

<sup>①</sup> 参见崔航:《呼伦贝尔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和对策》,《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足非遗保护工作需求。<sup>①</sup> 市本级财政尚未对呼伦贝尔地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发放传习补贴经费,参加各级政府组织的非遗展演、展示、传承活动也很少能解决传承人的基本吃、住、行、展品运输等费用,导致传承人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公共文化资金和非遗保护资金主要来自上级转移支付资金,旗县文化资金申请项目难度大,需要制作文本等前期费用较高。文化产业资金连年申报未果,标准过高,小微企业无法享受资金。各地区大部分传承人居住地较分散,而且在偏远的牧区,普查和搜集季节性的项目需要多次下乡,多次采访来进行挖掘整理。往往由于缺乏保护经费耽误了挖掘普查的最佳时机。之所以很多非遗项目不能很好地开展,大多数限于资金问题,每年国家级和自治区级的项目和传承人都有配套资金补助,其中每年国家级传承人2万元、自治区级传承人5000元,而到地市级和旗县级的传承项目和传承人是没有专门的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的,很多项目的开展都需要传承人自掏腰包,或者像当地非遗工作人员说的靠“情感”支撑运作。

6. 非遗保护项目产业化难度较大。一是部分非遗保护项目与现行法律有矛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非遗保护项目完整传承和发展。例如,达斡尔车制作技艺、桦树皮制作技艺选材过程均与现行法律相冲突,很难按传统方式完成选材及前期仪式。二是非遗传承人年龄普遍偏大,很难掌握新型传播、市场销售等手段。同时,对非遗产品及非遗系列衍生产品设计和功能开发等方面思维较为固化,很难适应现代社会需求,民族文化产品种类、数量和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三是文化遗产的资源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经济优势,相关非遗项目经营方式大多以手工作坊、家族式生产企业以及合作社形式为主,规模较小、产量及销量均较低,产业化有一定难度。

## (二) 呼伦贝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的对策建议

1. 加强各级传承人的保护和扶持力度,提升传承能力。抢救和保护那些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时代赋予的使命。因此,为解决非遗技艺传承人“断档”的问题,需组建一支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兼备的人才队伍。按照非遗项目、传承人的具体情况和不同类别特点,因“类”制宜地制定出符合“以人为本、活态传承”的保护措施。例如,对70岁以上的传承人进行抢救性保护,加强中青年非遗传承人能力建设;在后备传承人的培训和培养机制上探索切实可行的办法等。持续推进“非遗传承人研修研培计划”,提高传承人履职能力和水平。<sup>②</sup>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态传承,应落实传承人的各项保护措施,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力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最关键的就是对传承人的保护,失去了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一句空话。可学习借鉴日本的“人间国宝”的政策,在传承人的保护方面应制定一些措施,建立相应的保护机制。<sup>③</sup> 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数量较少,应有针对性地对国家级和省级传承人的传承项目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扶持,包括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的记录,传统技艺的整理,建立传习孵化器,对于市场前景广阔的易于产业化的传承人和传承项目给予资助。<sup>④</sup> 对已经认定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传承活动要采取必要的方式予以支持,包括

<sup>①</sup> 参见呼伦贝尔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关于申请呼伦贝尔市市级非遗保护专项经费的函》,2020年。

<sup>②</sup> 参见王学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体系在地方高校的构建与实践——以呼伦贝尔学院“三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为例》,《民族教育研究》2015年第6期。

<sup>③</sup> 参见韩冰:《日本“人间国宝”制度对我国的启示》,《边疆经济与文化》2016年第1期。

<sup>④</sup> 参见刘东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的文化意义阐释——基于“文化记忆”的研究视角》,《高校图书馆工作》2021年第1期。

整理有关技艺资料、提供传习场所,适当资助代表性的传承人传艺,组织开展研讨、展示、宣传、交流合作及提供其他帮助,有计划地征集并保管传承人的代表作品,建立代表性传承人的档案,给传承人提供一个非常有利于生存和传承的环境条件。

2. 深入挖掘非遗资源,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在保存好现有非遗项目的基础上,加强对非遗资源补充性调查,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加强数字文化馆和数字化资料库建设工作。采取数字化与网络化等保护方式,利用音像等多媒体手段进行记录,建立数据库;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形成资源共享。加强传统表演艺术和传统民俗活动的开发,提升现有民俗节庆品牌影响力,挖掘打造新的文化旅游品牌,形成合理的资源开发利用机制。加大非遗传习所和非遗研学基地建设,加强民族文化旅游品牌、特色小镇创建的建设,加大乡村基础设施、道路建设、医疗服务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充分挖掘历史文化、饮食文化、农耕文化、民俗文化,使非遗资源与饮食文化、民俗文化、传统手工艺等相结合,不断提高乡村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建立健全保护机制,将非遗保护纳入各级政府议事内容、财政预算、考核指标,推动各方面力量促进非遗保护工作协调发展。在呼伦贝尔市文旅广电、发改、财政、人社、住建、教育、卫生、体育、档案等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引导相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非遗保护保存工作,为非遗工作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3. 加强立法,完善保护机制。随着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氛围的整体提升,呼伦贝尔应逐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贯彻执行,做好相关的宣传工作。呼伦贝尔市人大应该结合本市非遗实际情况尽快出台相关的工作办法及条例,以规范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并结合非遗分布现状和保护工作实际,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宣传工作。<sup>①</sup>及时出台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非遗认定细则刻不容缓,从制度上和程序上,打破呼伦贝尔辖区内各旗县的地域界限,鼓励传承人的跨旗县级流动,坚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地落实传承项目及传承人认定工作。

4. 努力营造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氛围。组织各级各类文化骨干进行公益讲座;开展舞蹈、声乐、摄影、美术、非遗保护等方面的公益培训,开办各种公益展览。加强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业务及专业培训,树立典型,增强各项目传承人之间的交流合作,提升品牌意识,提高非遗产品及非遗衍生品设计能力,让非遗走进生活,提高非遗传承人履行非遗保护职责的能力和传承能力。将民族文化保护与文艺精品创作紧密结合,提倡和鼓励专业文艺团体、业余文艺骨干利用文化遗产项目内容创编、改编成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遗产情景剧等文艺节目,让人民群众,特别是少年儿童,了解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及传统礼仪文化。继续开展传承基地、民俗文化村的命名工作。对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代表性传承人,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表彰奖励、资助扶持等方式予以鼓励。

5. 促进文旅结合的市场化运作。非遗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特点和民族文化内涵及特质,蕴涵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如民间文艺资源、饮食文化资源、工艺美术资源和医疗技术资源等,市场化运作是促进其实现自我发展和自我保护的重要途径之一。要加大文化科技创新与整合力度,树立正确的产业发展观,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着力培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为非遗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提供保护基础。要从政策上继续扶持传统手工艺,在遵循传统手工艺

<sup>①</sup> 参见百秋、陈昊、刘悦、郑强、丁鹏:《呼伦贝尔市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立法保护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生产规律和运作方式的同时将其融入现代社会实践,生产贴近市场需求的产品作品,以产品消费促进经济提升。持续推进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整合现有的制作加工作坊、非遗传习所、非遗展示基地资源,向游客开放活态传承展示场所、非遗衍生品销售基地,拓展非遗旅游线路,推进传统文化资源、文化元素向旅游产品转化,构建非遗科学保护新格局。

## 六、结 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需要活态保护、活态传承。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保护传承与合理利用相结合,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文化产业、文创产业与乡村振兴产业相衔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融入现代生活,体现时代价值,是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念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提供了政策和方向指引。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产生于自给自足的狩猎采集、游牧、农耕、海洋等经济文化类型之中。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展开的。在这一历史条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既面临冲击、加速消亡的现实挑战,也面临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机遇。在后工业化的今天,经济全球化使得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很难与现代生活融合,如何通过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提供民众的文化自信,是这个时代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sup>①</sup>党的十九大将“加强文化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为坚定文化自信的一部分写入报告之中。《“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创新传播方式、增强科技赋能,把来自于人民、传承于人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持续推动其融入现代生活、体现当代价值,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sup>②</sup> 呼伦贝尔应以此为契机,抓好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的良好局面。

〔责任编辑 马 骅〕

<sup>①</sup> 参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生动实践》,鹤岗市向阳区人民政府网,<http://hgxyq.gov.cn/index.php?c=article&id=3086>,2020年11月13日。

<sup>②</sup> 参见郑海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令人瞩目》,《人民日报》2021年6月12日。

### **The History, Ideas, Propositions and Controversies of the " 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 ..... **Tong Dezhi and Fan Hao** (24)

**Abstract:** The " Black Lives Matter" (BLM) movement aro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This movement uses social media to form advantages such as diversification and networking, and exhib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ideas, propositions and actions. In the dimension of ideas, the BLM movement takes anti-racism as its core from which concepts are derived such as egalitarianism, communitarianism, femin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terms of policy, the BLM movement is committed to opposing systemic discrimination, pushing the reform of the police and judicial systems, promoting open borders and free immigration, achieving economic justice, reforming family structure, and nurturing Black cultural identity with the " art + culture" project and other requirements. The BLM movement has caused more intense controversies. These controversies not only reveal the plight of the BLM movement, but also reflect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of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Keywords:** Black Lives Matter; ideas; strategies of action; controversies.

### **Situational Effectiveness Research on the Tiered Governance in Tibetan-Inhabited**

**Areas in Sichuan, Gansu, Qinghai, and Yunnan Provinces: Highlighting on the Review of the Public Service** ..... **Chen Jingan and Liu Wei** (35)

**Abstract:** Effective governance in Tibetan-inhabited areas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core concerns of Chinese government. The public service delivered through governmental bureaucracy is the important strategy for the border security and Tibetan stability, which is holistic governance and possesses the features of the " tiao-kuai" 条块 (hierarchic or tiered arrangement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Based on a sample survey in Tibetan-inhabited areas in Sichuan, Gansu, Qinghai, Yunnan Provinces, the paper reveals that public service's efficacy results show more on the " kuai" (tiered) arrangement than on the " tiao" (hierarchic) one. Therefore, it argues that the hierarchic governance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tiered governance, contingent on situational effectiveness. To enhance the efficacy of governance strategies in Tibetan-inhabited areas, the tiered arrangement should be more pliable. A similar structure from government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aspects is analyzed to prove and expand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situational effectiveness. Moreover, the study suggests three possible ways of tiered governance and further support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ituational effectiveness governance in Tibetan-inhabited areas in Sichuan, Gansu, Qinghai and Yunnan.

**Keywords:** governance in Tibetan-inhabited areas; public service; governance efficacy; situational effectiveness.

### **An Investigation on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Inheritance in Hulun Buir Region** ..... **Liu Xiaochun and Wuri Wute** (52)

**Abstract:** As a historical witness to the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of ethnic groups, Hulun Buir region has multi-ethnic communities and ric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with important practical and academic significance of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Chinese culture. At present, Hulun Buir region has establish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4-leve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system, and its database is being perfected.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lun Buir takes on local, ethnic and diversified features. Through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Hulun Buir region are making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while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which need five adjustments: legal construction, policy support, talent training, guarantee of representative bearer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ntrance into schools, actual production transition, etc.

**Keywords:** Hulun Bui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neoclassic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of Anthony D. Smith's Ethno-Symbolism**

..... **Lin Lin and Lai Hairong** (67)

**Abstract:** Ethno-symbolism and modernism are the two most influential thoughts in modern western theories on nation and nationalism. Since the 1980s, Anthony D. Smith has often mentioned in his works that ethno-symbolism is not in opposition to modernism. In his book *Ethno-Symbolism and Nationalism: A Cultural Approach* published in 2009, Smith clearly points out that ethno-symbolism aims to supplement and revise modernism. It revises modernism's single focus on "modern" with a long-term historical analysis. It revises modernism's "excessive"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the elite with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masses. And it revises the "excessive" emphasis of modernism on the objective motives of nationalism with the effect of emotional factors. Anthony D. Smith's in-depth exposi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no-symbolism and modernism shows the new development of ethno-symbolism theory and provides a more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western theories on nation and nationalism.

**Keywords:** ethno-symbolism; Anthony D. Smith; modernism; nationalism.

**Kunming-Bangkok International Road and Social Changes of a Thai Town,**

**Chiang Khong** ..... **Zhang Nan** (74)

**Abstract:** Kunming-Bangkok International Road connects China, Laos and Thailand, which is called the "economic corridor" of Lancang Mekong cooperation sub-region. As a node of this road, Chiang Khong town tries to become one of the the "centers" of transnational regional economy from the "edge" of the country. When the road was connected with Chiang Khong Port, the old town became the "center"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with a large transient population and many vehicles. After the Fourth Bridge of Thai and Laos was constructed, the international port was moved to the new town, and the old town returned to the "edge" again. It is the combined effect of non-place factors, such as the design of "logistics city," adjustment of Thai national policies, and regional factor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industrial chain. This road from China to Thailand is constantly updating local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people and expectations for the future Chinese opportunities. It is also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old town to return to the "center"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Keywords:** Kunming-Bangkok International Road; Thailand; Chiang Khong; non-place.

**A Study on the Sönit in the Mongol Yeke Qol of the 13th Century**

..... **Qiu Zhirong** (89)

**Abstract:** The Yeke qol, established by Chinggis Khan as the guards directly under the Mongol Khan, was the most important power in the pre-Yuan period. Many of its generals came from the Sönit clan. Taking the Sönit tribe as a clue, based on Persian sources *Jāmi' al-Tavārikh*, and Chinese and Mongolian literature concerned, 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Yeke qol in the 13th century, and especially the fact that Kublai Khan founded his own Keshig army after his accession. The discrepancy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Sönits in the historical sources, is related to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ir political status in different periods.

**Keywords:** Yuan Dynasty; Mongolia;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rigin of clan.

**Maolaowei 猫老尉 Family Documents and Ethnic Interaction in Taiwan under the Qing Dynasty** .....

**Yang Guozhen and Yu Shuai** (99)

**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aiwa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